

## 一、“钓大鱼”钓出了大字报

### 1. 短暂的春天

要追溯大字报的历史，不能不回顾 1957 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

这本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齐放、令人舒坦的春天。可惜，春光虽然好，酷暑却早来。

这年开春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大张旗鼓地号召党外人士帮助自己改进作风，以整顿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也就是帮助党整顿“三风”。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有过好几次整风。

第一次在延安时期。这次整风时间很长，从 1942 年春至 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整风运动中，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受到了沉重打击，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整风在 1948 年前后。这次是各解放区党组织结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进行的。这次整风，声势虽没有延安整风大，但对纯洁党的组织，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整风则发生在新中国建国之初。通过这次整风，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初步经验，保证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顺利实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要在 1957 年春天开始发动一场新的

整风运动，也是事出有因。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sup>①</sup>

既然要用“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去克服这些“严重的缺点”，自然要采用整风的办法。

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sup>②</sup>

为什么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去整顿三风？毛泽东在讲话中解释说：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 把人救了 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不是讲讲而已。<sup>③</sup>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整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由于受国际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sup>③</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和社会改造的急进行，使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因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上遇到不少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由于中共鼓励“百家争鸣”，对时局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时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甚至对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和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面对这种新的形势，许多干部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以阶级斗争的老眼光对待新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区分和对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尽管当时出现了学生闹事、工人罢工，还有一些教授的“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形势看得很严重。他认为闹事的原因，除了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存在的因素外，主要还是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上犯了错误，或者是工作方法不对。至于民主人士，毛泽东说，“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只有国民党才害怕批评。

①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同年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决定按照既定的方针把整风运动发动起来，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甚至表示，领导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天后，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指示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上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增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sup>①</sup>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启动。

为了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党外人士

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其中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 and 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sup>①</sup>

中共中央还明确指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这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相继举行座谈会。上海最先行动，这份指示发出的第四天，《解放日报》就邀请 22 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请他们谈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旧时代，人们总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来形容中国的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其实，这并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现在党鼓励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向自己提意见，党外人士们也就不客气，他们畅所欲言，对党的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作了大量的批评。《解放日报》在 5 月 10 日的第 2 版上，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毛泽东看到这些发言的内容后，对座谈会上揭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很重视，他在这份报纸的边上批示道：“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看一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写完这段话，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在旁边加写道：“请你们注意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这个批示说明，毛泽东对这些批评意见是何等重视！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24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对这些座谈会的发言，《人民日报》都及时作了报道。

这两次座谈会从 5 月 1 日一直开到 5 月中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了 13 次，70 多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了 25 次，108 人次发言。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学校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这些座谈会的发言，也分别登载在各地的报纸上和高校的校报上。有“知识分子喉舌”之称的《光明日报》，先后在上海、天津等全国九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并作了详尽的报道。

在“鸣放”过程中，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回忆，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sup>①</sup>。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利用共产党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

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

有人认为要改变这种一党天下的局面，就必须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执政”，说“一党执政有害处”

“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纲领来，由群众自由地选择，这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 829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样好得多”。

也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甚至有趁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意。他们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

还有人怀疑共产党这次整风运动的动机，用煽动的语气说，“过去几次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更有人把矛头对向了毛泽东，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如此等等。

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警惕性一直很高。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整个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那时，李维汉时常向毛泽东汇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的情况，各地整风的动态和党外人士的各种言论也源源不断地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当毛泽东看到上面这些言论的时候，很快就敏锐地觉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中旬，“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言论“放”了出来。毛泽东在听李维汉汇报时，开始皱眉头了，并且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毛泽东还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在汇报中，李维汉提及一位高级民主人士称，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毛泽东立即回答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立即发

给党内干部阅读，使他们早点心中有数。文章以严肃的语气告诫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sup>①</sup>

文章中，毛泽东还给右派分子划定了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他还用调侃的语气说：“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文章写好之后，毛泽东先是批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彭真阅看，然后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文章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内蒙党委”。在文章印好之后，他又特地提醒：“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结果，这篇文章在当时和第二年都未发表，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于1977年4月公开发表。

正因为这篇文章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知道，所以党外人士，包括右派分子并不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且《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刊上。

至于为何要继续把那些“右派言论”登在报上，毛泽东的策略

<sup>①</sup>《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0~471、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是：“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 以便锄掉它 灭掉它”。

后来，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

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sup>①</sup>

于是乎，在此后 20 天的时间，各种座谈会照样开，“右派言论”照常登报。一时间，各种言论都放出来了，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颇为热闹。

在“鸣放”的过程中，能参加各级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或在报刊上发表自己言论的党外人士，毕竟只是少数人，鼓励“鸣放”的政策和“引蛇出洞”的策略，又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政治热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学校，年轻的学子们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他们有幸参加者不会很多；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也极少有机会学校虽有校报，但一般是周刊，也登不了几篇文章。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们的政治热情消退，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言论的方式——写贴大字报。

##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上分析，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1957 年 5 月 27 日《文汇报》（上海）登载了驻京记者刘光华发回的报道——《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虽然后来反右派的时候这篇报道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文汇报》也为此一再做检讨。记者刘光

<sup>①</sup>《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531～53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华本人也被揭发是“右派分子”，但这篇报道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北大第一批大字报的情况。

这篇报道后来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报道的头两段便对北大党委的整风颇含微词，报道称：

前不久，未名湖滨的政治气候，还是春寒乍敛、轻雷隐隐的惊蛰时分。可是，不到几天工夫，百花一夜齐放，而动力的源泉却是我们生气勃勃的年轻学生。

自党号召整风以来，北大同学都时时刻刻在关心这个运动的开展。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希望帮助党来洗涤尘垢。同学们都希望北大党委能大胆地放手，让大家来参加整风运动。起初，党委对同学们的要求似乎估计不足，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照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同学们的学业。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却自动积极起来参加北大的整风运动。

这些“小伙子 and 姑娘们”当然看不到只有高级干部们才能看到的机密文件，无从知晓“引蛇出洞”的策略，在5月19日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轨迹，历史的进程总是给人们留下无数的遗憾和无限的感叹。也正是这些遗憾和感叹，才使历史变得丰富多彩。北大的那帮“小伙子 and 姑娘们”，如果真按照北大党委“慢条斯理”的既定整风步骤，等到暑假开始后再去参加整风，也许北大后来划定的五百余名学生“右派”中要少列上一些人的名字。可惜，他们的积极性太高，政治热情太炽，终于按捺不住。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

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看来这个建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北大的“民主墙”很快就诞生了。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在当晚的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北大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当众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崔雄昆这个表态，用记者刘光华的话说，“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次日清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墙壁已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布满。刘光华在他那篇惹祸的报道中，用了唐朝诗人岑参的两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大字报之多。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北大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大学生们写张大字报自然不费劲，内容则大多是对学校及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与建议，也有不少是对崔雄昆的话提出批评，说他实际上是压制大字报，阻止同学“鸣放”。

在头两天的大字报中，内容主要集中这几个问题：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政治课教学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应该取消或改为选修；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错斗者要道歉；加强校务委员会，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等等。这些言论，后来被一律斥为“右派言论”。

5月20日这一天的大字报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沈泽宜、张元勋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诗。他们在诗中写道：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  
    看一看天光。

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人世的樊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

昨天我还不肯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①

① 转引自迟蓼洲编：《1957年的春天》，第36~37页，学习出版社，1958。

这首诗刚一贴出，便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人说，“五四”的火炬是对向敌人的，对人民内部就不应该再举起，并指责作者的情调简直像是白毛女申冤。也有人为这首大字报诗大为叫好，说是唱出了青年人心底的声音。一个叫刘奇弟的学生还当场咏和了一首题为《白毛女申冤》的诗，诗中说：“我的冤屈像白毛女”。诗作者后来的命运就不用说了，沈泽宜、张元勋、刘奇弟都上了“右派分子”的名单，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右派”。

5月20日这天大字报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称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大字报《一株毒草》。就凭这个标题，谭天荣也就够“右派”资格了。这到底是一株怎样的“毒草”？谭天荣在大字报中说：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指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引者）却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做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

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圆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sup>①</sup>

谭天荣写了这《一株毒草》还觉得不过瘾，又连续写了《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第四株毒草》、《再谈人性与阶级性》、《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几句人情话》、《救救心灵》等大字报，有的甚至是在报刊上对他进行公开批判后写的。正因为有这些“毒草”，谭天荣成了北大最有名的“右派”。

就在谭天荣贴出《一株毒草》这张大字报的当天下午 5 时 20 分，北大宿舍和饭厅的墙壁上贴出了 162 张大字报。当然，这些大字报中，并不全是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写的，不少大字报是与之展开辩论的。

21 日，前面说及的刘奇弟，贴出了足以使所有北夫人都惊骇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说：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做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 今天旧案重翻 我要为胡风说话 更精确地说 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着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 28~29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做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 我要求 政府 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sup>①</sup>

这张大字报公开为两年前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胡风等人鸣冤叫屈，这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刘奇弟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奇弟写的别的大字报的内容暂且不论，当我们读到这张大字报时，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在这份大字报贴出整整三十年后，中共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推翻了过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 113~114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实之词。

到 5 月 22 日，北大已经贴出了 500 余张大字报。到 6 月中旬正式公开反击右派时，北大的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增多。这些大字报中不少被当做“右派”大字报被抄录下来，供批判使用，使我们今天能窥知这些大字报到底说了些什么。

北大一名学生在《谈“党的领导”》的大字报中说：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承认”？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有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进行行政工作时，应以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为依据。也不需要强迫每一个公民承认，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它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它的领导一定要服从。党领导得好，人民群众自动会接受，领导得不好，人民群众要起来反对也难免的，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3)共产党给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事实证明党员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泛滥得很厉害，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为什么共产党会出这许多毛病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进行工作时是非法的，由第二种领导（教育性的）跨进了第一种领导（行政性的）。由于现有政权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一贯地以领导

者自居，不肯充分发扬民主，以致共产党作了好多好事情的同时也犯了好多不应有的错误。<sup>①</sup>

另一个自称“疯子”的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题为《“疯子”的话》的大字报，内称：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上下的，为了威信不必害怕承认错误吧！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会有好处吗？

再说几年来学校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座大山，沉重的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迸发出来，“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烧起来。

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镇静（正经），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社会主义基础只会因为清洗掉少数混蛋、寄生虫，而更加巩固起来。是谁在人民中筑起千万条鸿沟，是谁在人们中传播彼此不信任的气氛，是谁使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吧！这些坏人坏事的存在发展，一定有领导上的支持，我想这和党委制不是没有联系的。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力归于校行政、学生会、班会。我要求政治上及其他方面扩大民主，哪些东西已是党内“英雄”们可以知道的，哪些东西还可以让非党的“群氓”知道，也应有明确规定。可惜不知共产主义者对“人民是

《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第 89-90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